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初探

何俊生<sup>1</sup>, 张 英<sup>2</sup>

(1.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2. 西藏民族学院思政室,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深刻阐明了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性以及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民族理论; 政策; 原则

**中图分类号:** A841; A849.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3-0012-04

The Preliminary Reserch on National Theory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HE Jun-sheng<sup>1</sup>, ZHANG Yi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2. Department of Thinking and Politics, Tibet Nation Institute,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theory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s theory. This theory explicitly points out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policy of recognizing and handling correct national relation. The theory deeply defines a harmfulness about big Han national thought and narrow nationalism, and it is necessary to object to the two kinds of mistaken tendencies for a long time. This theory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t set up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aking correct national policy of our party and nation, and the theory can guide to our national work.

**Key words**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national theory; policy; principle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现已确认的少数民族有 55 个。民族问题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民族政策、指导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依据。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国内各民族间的矛盾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论述较少。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少数民族问题凸显

出来,毛泽东、邓小平根据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实际和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客观需要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邓小平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等重要著作中,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正确  
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  
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少,在全国现有总人

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10%,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民族种类多,居住的面积大,约占全国总面积近 60%,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大部分聚居在边疆地区,国防地位显得十分重要。因此,能否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对于防止外敌入侵、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 1950 年邓小平进军大西南时就指出:“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sup>[1]</sup>。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在谈到少数民族问题时也指出:“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sup>[2]</sup>。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他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系统总结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十大重要关系。在论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个重要特点。他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sup>[2]</sup>。正因为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因而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这对于合理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和加快全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优势,不仅加快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且也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在 1987 年还强调指出:“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sup>[3]</sup>。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成为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和邓小平不仅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意义,而且充分论证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坚持民族平等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前提。早在 1924 年,孙中山先生在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sup>[4]</sup>。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所写的《论联合政府》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中共的民族政策与孙先生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sup>[4]</sup>。由此可见,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民族政策都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放在首位,作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前提。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再次肯定了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历史作用以及他们和汉族之间的血肉联系,分析了形成中国民族关系不平等的原因及其长期影响,强调了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造成的影响,就是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sup>[2]</sup>。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中期近 30 年的时间里,尽管我们在民族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民族平等的原则,从根本上革除了旧中国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积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平等的原则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1987 年 6 月,邓小平在谈

及西藏问题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sup>[3]</sup>。

第二,加强民族团结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反复证明,无论是抵御外敌入侵还是促进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是十分重要的。增强民族团结则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出现民族分裂则中华民族衰弱甚至给外敌入侵以可乘之机。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旧中国各民族间的隔阂是相当深的,这也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小平在1950年就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sup>[1]</sup>。毛泽东在同一时期规划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时更加强调了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和群众自愿,必须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必须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毛泽东指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需谨慎对待……。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sup>[2]</sup>。1957年,毛泽东把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到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基本保证的高度。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胜的基本保证”<sup>[2]</sup>。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空前增强,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充分保证。实践证明,加强民族团结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目标。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各民族发展繁荣,使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950年邓小平在谈到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就指出:“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sup>[1]</sup>。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改革,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1956

年,鉴于苏联在处理俄罗斯同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方面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sup>[2]</sup>。总之,判断少数民族政策制定得是否正确,少数民族问题处理是否适当,关键还是要看少数民族地区是否真正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这是判断的根本标准。1987年邓小平在谈到西藏问题时针对一些错误观点深刻地指出:“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sup>[3]</sup>。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适用于西藏,而且也适用于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总之,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

###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充分论证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民族事务的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和邓小平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重要特点,不仅主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而且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管理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该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邓小平根据《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在1950年就指出:“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sup>[1]</sup>。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人民从中得到实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

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得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sup>[1]</sup>。

要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到实处,关键是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指出:“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sup>[2]</sup>。邓小平也认为,即使有必要派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工作,也要尽量做到少而精,派真正能够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工作的干部去,并且要征得民族地区的同意。“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sup>[1]</sup>。

既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那末实行的政策就应与汉族地区不同,要体现出民族地区的特点。必须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尊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意愿,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边疆的巩固和民族团结。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那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sup>[1]</sup>。五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是正确的。正因为我们长期实行了有别于汉族的一些政策,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才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快速发展。

邓小平不仅强调民族政策上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培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上的认同感。他指出:“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因为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特点的直接体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就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 四、毛泽东和邓小平深刻阐明了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必须 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大汉族主义,另一种是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直接危害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策的贯彻落实,如不坚决反对,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不

仅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和国家安全,而且会影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在这两种错误倾向中,以大汉族主义最为严重。邓小平在1950年就明确指出:“只要一抛弃大汉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sup>[1]</sup>。可见,这两种倾向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障碍,但首先和主要的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总结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经验时,又一次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sup>[2]</sup>。只有正确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此,应该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和政策上的灵活性。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要著作中,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民族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去正确处理。处理民族矛盾的关键仍然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无论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专政方法去处理。毛泽东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sup>[2]</sup>。毛泽东将新中国的民族矛盾归结为人民内部矛盾有很重要的意义,为防止把民族矛盾作为阶级斗争来处理奠定了理论基础。1957年以后的20年中,尽管从全国整体而言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就民族关系而言,总体上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多数情况下把民族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妥善处理,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这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能够得以长期巩固发展的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